

我想象中的^{*}人类学

——人类学学者访谈录之三十七

□徐杰舜/问,王铭铭/答

王铭铭教授的来信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主编:

贵刊于2005年第6期刊发徐杰舜教授与我的对谈录《我想象中的^{*}人类学》,刊出内容包含极其大量的严重错误。文章中的主要受访人是我。贵刊该期访谈所刊之内容为录音整理初稿。要强调指出,录音整理人在完成整理工作后,仍感到不能把握其中字句、用辞、中外人名及内容,故为我提供了初稿,由我对初稿进行大量修订。我对其中包含的字句错误和内容上的误解进行了修改,并早已将修改稿发给执行主编徐教授。遗憾的是,贵刊刊出了录音整理人提供的初稿,这个初稿虽代表整理者对我的谈话的“读解”,但却因未经我的审读而离我原来所想表达的内容相去甚远。鉴于问题十分严重,本人特作以下声明:(1)本人对于贵刊在以上方面所出现的疏忽表示遗憾;(2)本人恳切要求编辑部在贵刊2006年第1期中刊登文章,对问题作出负责任的说明。请贵刊刊登此声明。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王铭铭

编者按:本刊2005年第六期发表的徐杰舜问,王铭铭答的人类学访谈录《我想象中的^{*}人类学》,由于编务人员的调动,以及电脑操作的错误,将录音整理的草稿误为正稿编发了,从而造成失误,在此特向徐杰舜和王铭铭教授致歉,向读者致歉。为了纠正“缪种”流传,本刊除了及时与有关文摘刊物通报情况外,决定在2006年第一期重新刊发,以正视听。



王铭铭教授

[作者简介] 王铭铭(1962~),男,北京大学人类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社会人类学理论与方法、中国社会与文化研究。徐杰舜(1943~),男,浙江余姚人,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生导师,广西民族学院教授。广西南宁,邮编:530006。

[摘要] 中国人类学有三个圈子要研究,第一圈就是核心圈,叫做农民的,城乡关系,包括农民的研究;第二圈是当时少数民族自治,或者由土司统治的,跟中央朝廷形成朝贡关系的;第三圈就是或者跟中央朝廷形成朝贡关系,或者没有的,但是史书上有记载的这些外国的风物、民俗、人情。中国古代如此之多的海外研究技术,到了现代的时候衰败了,为什么衰败了?因为我们从一个天下主义的概念,转型成为国族主义,内部化了。所以现在对人类学至为关键的是,不只要从事海外研究,而是要在一个比较天下主义的概念下面去思考人类学未来的走势。

[关键词] 中国人类学;想象;核心圈

[中图分类号] C9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3887(2005)06-0058-15

* 访谈于2005年3月17日上午在南宁市凤凰宾馆的客房里进行,由徐杰舜(简称“徐”)问,王铭铭(简称“王”)答,参加访谈的还有广西民族学院研究生杨清媚、林敏霞(简称“杨”、“林”)。

Anthropology in My Imagination

—An Interview with Anthropologists (37)

XU Jie shun, WANG Ming ming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Nanning 530006, China)

Abstract: Three main layers of anthropology are yet to be researched in to in China. The first one is at the core, which studies the rural urban relationship, including the peasants. The second layer focuses on those who have tributary relationship with the imperial court and ruled by Tusi or national autonomy. The third layer studies the goods, customs and habits of foreign countries who have or have no tributary relationship with the imperial court, but are recorded in his toric documents. The first layer has developed into folk Chinese anthropology. The second layer is ethnology. Yet why so many foreign techniques in ancient China suffer a downfall in modern times is that we have internalized from global ism to nationalism. Therefore, what matters most to anthropology is to consider the future trend of anthropology with a global perspective rather than doing over seas research.

Key Words: Chinese anthropology; imagine; core layer

徐：很荣幸邀请到王教授来“绿城”(南宁)。现在正是鸟语花香的时候，就当放飞一下心情吧！从北京飞到这里要3个钟头啊，辛苦了！请王教授到这里是我们多年的心愿，今天终于能够实现，我们感到非常高兴！今天我们的采访，作为常规，请你首先介绍一下你的经历。

王：感到荣幸应当是我，可你是说从幼儿时代说起吗？(笑)

徐：随你怎么说，反正你将背景介绍给大家。

王：我是闽南人，讲的是闽南话，读小学中学的时候已是“文革”了，所以我不是古老的闽南人。

徐：你在哪里读的小学？

王：“文革”时我在泉州的东方红小学读书。

徐：你是李亦园先生的老乡？

王：对，实际他老家的屋子离我家的屋子不远……后来，我中学是在泉州第三中学度过的。当时小学、初中都还可以，成绩很好。但是到了初中(读的是泉州三中)以后就不行了，因为当时跟一位来自北京的韩琳老师学音乐，梦想当音乐家，花了大量时间学小提琴。

徐：现在还在拉吗？

王：现在不会拉了，只能拉出杂音，让自己的耳朵难受，所以就不拉了。但是少年时练了七八年吧，甚至因此没有去高考。我等到1981年才考，此前考了几次艺术院校没考上，最后复习文科，考上后选了考古学专业。

徐：难怪你现在还有一些艺术家的气质。那你 是怎样走上人类学道路的？

王：从小提琴转入考古学，刚开始有点失落感，

但看来没有办法，只好想那是因为幸运。成为音乐家，这辈子只能是梦里才可能了。不过，做人类学研究者也不错。我的母校是厦门大学，于1983年成立人类学系，把历史系考古学专业的本科生全部挖过去了，这样我就成为第一届人类学本科生，跟人类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人类学系成立之前我也读到一点书，对有关现象感兴趣。我们闽南地区存在特别多的“人类学现象”，比如说被我们叫做“迷信”的一些奇异风俗，上中学时，我对这些现象已感到有兴趣，那时想不通它们为什么存在，记得高中还写过一篇作文，表达了我的困惑。后来，在大学读考古学，知道考古学里边对这些现象有些解释。另外，我也接触到林惠祥先生的一些论著，例如20世纪80年代初期重印的一本林惠祥人类学论著的选编，里头有一些涉及到神话和“算命”的研究，深深地吸引了我，它们可以说是对我生活的地区的某种解释。当时，也感觉到自己有一个冲动。当时我学考古，成绩很好，对器物等等特别在行。实习期间，我走了许多地方。当时考古学的经费有限，离社会现实比较远，不像今天这么被人重视。受当时风气的影响，我以为考古学既辛苦又难以对社会做出贡献，而作为一位年轻人，我当时又有一个“承担社会责任”的冲动，想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那时，我想来想去，想不出考古学有什么太大的用场。我现在发觉当时的想法纯粹是一个误会。不过，20年前，一听到“人类学”这三个字，总还是觉得有新异之处，况且当时还读到一点书，感觉这门学科更多的是研究当代社会，或者说，它不只是研究古代社会，还研究当代社会，我就特别兴奋，觉得人类学给了我一个好机会。我对人

徐杰舜 / 问，王铭铭 / 答 / 我想象中的人类学

类学的兴趣便越来越浓了。我上大学时，厦门大学的人类学特别不错，老师特别团结，教学、科研、出版、展示，都有成果。陈国强先生是系主任，他后来是我的硕士导师，去年他去世了。陈老师是一个社会活动能力和学术能力都很强的人，在他的带动下，厦门大学的人类学办得有声有色，让我们这些学生感到有些刺激。

徐：那个时候，厦门大学的人类学应该是全国最好的。

王：嗯，这我同意。不过，说实在话，当时的老师也不能说完全能满足我们这些初生牛犊的求知欲望。本科的时候，多数课我们都已听过了。到了硕士生的时候，老师讲课有时还是老生常谈。比如，关于民族的介绍，老师大多只是点到为止，除了古越族、畚族、高山族，处于东南沿海的厦门大学研究得不多，老师在介绍研究成果时，比较缺乏生动。但是，当时的气氛非常良好，对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影响也是特别积极的。我是85(1985)级的研究生，从85级到后来的好几级，硕士生学习都很认真，也有机会从事独立研究。那时老师跟今天的也不同，今天我们学生招得越来越多了，而且满街都是博导，硕士生当然就没人管了。包括我自己吧，我们现在对硕士生的关照也不够。而我们当时硕士生数量就少，作为学生，我们把自己的研究当成一个重要事业。机会也很难得，那时的老师都把我们当一回事儿，不像今天。对我们特别有用的，是老师编书一事。陈国强老师喜欢编书，也经常叫我们学生去参与写作，协助他整理一些资料。我记得在1985年国家教委有一个叫做《人类学概论》的课题，由陈老师主持，意图是编写人类学的“部编教材”。陈老师工作繁忙，书也写得多。那本书就让我们来帮他写一把。为了讨论编写问题，陈老师还召集了一次讨论会。作为他的学生，我有机会参加会议并接待贵宾，有幸认识了宋蜀华、童恩正、容观瓊等老师。记得我是在厦大门口撞见宋先生的，他面带微笑，竟说看过我的习作。那些我写的乱七八糟的、不成样子的东西，他竟也关注！宋先生还鼓励说：“你这小伙子不错啊”等等。最近我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这件事，宋先生总是带着微笑，对晚辈特别鼓励。童先生长得很帅，风度翩翩，讲演时来了极多人，他跟我交往也多些，去美国后，还来信，我当时在英国学习，他很高兴，很鼓励。容先生对我们年轻人也很鼓励，记得我出国前在中山大学学英语，他最后请我吃了顿烧鸭，好吃极了。二十多年前开始接触人类学时，老一代对晚辈的鼓励，使我们这代人对于学科有了更多的积极性。这是我特别感怀的一件事。

徐：这也给了你人类学的印记和素质。

王：对，在厦门大学的那几年，让我对人类学充满兴趣，在我身上打上了“人类学”的烙印。说到这个印记，我们不应忘记，但它又时常被人们遗忘。一转眼，我留学归国已11年了。在英国留学7年，又给了我一个所谓“海归”的印记。实际上，说是“海归”，我也不能同意，因为我的人类学经历比一些同行相对不单纯，我相当于是在“海龟”和“土鳖”之间的一种形态。我的人类学是在国内先学，再到国外去学的，不像其他有的“海归”，成分比较纯，也比较“牛皮”，我不纯粹。我留学的机会，得来也是偶然的，不是因为自己争取，或者因为自己有留学的命。当时厦大有三个中英友好奖学金的名额，推荐一批硕士生去考，结果第一批优秀生英语并非合格。当时，陈国强先生是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正在犯愁，这被一位师兄范可听见了，他就跟陈老师讲，“哎，我们系好像王铭铭的英语不错，不妨让他去试试看啊？”果然，那天中午陈老师到我宿舍来，他说：“铭铭！中午到学校去考试。”我说：“考什么？”“考英语！”，他说。中午，我真的参加了托福考试！还考了合格。这样，就偶然去了英国。

徐：能否把到英国留学的经历多给我们讲讲。

王：我刚才说到，留学一事出于偶然。此前，美国夏威夷大学有个研究东南亚考古学的教授叫做威廉·索尔海姆(William Solheim)曾来厦门大学讲学。我帮他翻译。他对我这个学生也有好印象。我也曾想过是否跟他学考古算了。我姨妈是个海外华人，曾说可以资助我去跟这个教授学考古，特别是东南亚考古。东南亚研究，在厦大是很重要的一门学问，那里的南洋研究院知名度很高。如果当时真的从厦门大学去跟索尔海姆学考古，现在我可能已是南洋研究院的考古学研究人员了。中英友好奖学金的偶然机会，改变了我的道路。我因为有这样的机会去了英国。到英国时，我本也可以按照国家教委的有关规定任选学科(我们一起去的人中很多文科的学生都跳槽，从英语跳成社会学，从政治教育跳成金融学……)。也许是因为当时我“犯傻”，我还是选了亚洲人类学，选了伦敦大学东方非洲学院(SOAS)。这个选择当然也没有什么不好，跳槽的同学过得极好，我呢，虽有点不好，但基本上也还算不赖。东方非洲学院是什么呢？大致说来，英国没有外交学，他曾是“日不落帝国”，只有殖民地，没有外交对象。我们那个学院，主要是为了培养殖民地官员而设的，实际就是它的外交学院，现在毕业生，很多还在英国外交部门工作的，后来逐渐随着时代的变化，学院增添了各种社会科学门类，招徕世界各地的学生。这家学院离伦敦经济学院(LSE)很近，不过二者特色不同。

徐:你到底是在哪家学院学习的?

王:我的学院是东方非洲学院,我在人类学系学习,这个学院是伦敦大学的五十多家学院之一,其他的更有名的还有帝国理工学院。在文科学院里,东方非洲学院的教学和科研一直都很强,最近排名还是全英A级,人类学教学也很有名。伦敦的人类学系4家,除了伦敦经济学院、东方非洲学院之外,还有大学学院和歌德斯密学院有人类学系。这4家中,大学学院的人类学是综合型的,比较像古典人类学,而其他3家,则都属于社会人类学。伦敦经济学院跨学科研究比较多,学科的基础比较扎实,在人类学研究方面,风格与我所去的学院不同。相对来说,我们的学院比较“小资”一点,老师穿戴比较硬派一点,伦敦经济学院偏“左”,培养了大批第三世界的领袖级人物,学生中出了不少部长,所以学院更有钱,第三世界的当了部长的学生回来朝圣,伦敦经济学院都给他们安上个什么“名誉院士”之类的头衔,像费孝通先生就是一个“Honourary Fellow”(即名义院士)。我们的学院比较“小资”,比较“右”,跟第三世界的关系相对要紧张一点。我的一位忘年之交,曾在学院任人类学老师,因亲近马克思主义,参与反战,而于70年代中期被开除,说明学院曾是很保守的。不过,它也有它的特点。伦敦经济学院的人类学家更多的是普遍主义者,他们认为人还是有共同的特征。最早当然就是马林诺夫斯基说的,文化都是满足人的需要,它的差别是重要的,但是在这个满足需要的层次上是一致的。最近,伦敦经济学院的人类学又转向“认知人类学”,主张探究人在认识世界时具有的一致性。那里的人类学家认为,文化不能将人熏陶得相互之间完全不同。现在,“认知人类学”的新潮在伦敦经济学院很盛行,甚至可以说是最具支配性的,这方面课题很多,来学的学生也最多。我们学院相对来说做区域研究比较厉害。东方非洲学院实际有个做“区域研究”(area studies)的传统。依据这个传统,学院把世界区分成几个大区,形成以各个大区的专家为群体的格局。比如说,印度学、非洲学、中国学,反正这一类的学问,在东方非洲学院很盛。我们的学院图书馆特别好,库存着来自全世界的各种图书。

徐:那你跟哪位导师学习?

王:与一些留学归国的同事有所不同的是,指导我的导师并不是大师。记得我到系里报到,秘书让我找Richard Tapper博士学习,他是博士预备阶段所有研究生的导师,是研究中东的专家。系里当时最有名的,应算是David Parkin教授,他是研究非洲的,提出新结构主义的许多论点,特别是在语义人类学方面有建树。结构人类学侧重句法,而Parkin教

授提出要研究语义,就是针对某些关键词展开比较文化研究,编过涉及“罪过”概念的一本有名论著。后来,前些年,他去了牛津大学,任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曾长期任英联邦社会人类学会会长。选导师时,我先是选了他,他对中国也有兴趣,我从他那里得到不少帮助。Parkin老师对中国的事物所知甚少,只是于80年代末期来开过会。1998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我们举办第三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他来讲演过。我的学生去接他,他说“啊,你们是我的孙子!因为你们的老师是我的学生王铭铭。”他认为在社会伦理方面中国是跟非洲有相通之处——算辈分。在伦敦学习期间,我对他的研究方式颇感兴趣。我也计划跟随他做一点文化的语义分析,当时写了篇涉及“幸福观念”的论文,是用英文写的,后来中文版在我的《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一书中发表。这篇文章就是在他的指导下完成的。我当时写那篇文章,意图是想从村落中的中国人对于“福”的理解入手,反观主流的现代西方实利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同类观念。Parkin老师觉得蛮好,到了我完成田野工作回英国写博士论文时, Parkin还是给了我一点指导。可是那时我的研究题目已经变了,变成了对仪式和社会空间的研究,我论文的第一稿由他审阅过,读后他说,“这不是人类学!是百科全书!”从事非洲研究的人类学家大多认为人类学主要研究村子,对我博士论文做的城市仪式和历史人类学研究不习惯。他要求我换个方式。我最后还是听了他的。在书写论文的过程中,系里劝我找中国学专家来指导。系里有两个中国学专家,分别是Elizebeth Croll和Stuart Thompson,水平都不错,系里就征求他们和我双方的意见,让他们来指导我的论文。我的两位导师中,Stuart Thompson特别尽心,书教得特别好,我回国后听说他任了我们学院的总考官。他研究中国,田野工作是在台湾做的,阅读面也特别广,他也做了几篇论文,就是性子比较慢,文章写得太少。跟这样一个不太知名的老师,有好处,他特别细致,也有更多时间来帮我修改论文。我写论文的那年,他每章都要细读,读后批改得很认真。Thompson老师的工作特别认真,阅读面广,对一些前沿思想跟得很快,经常告诉我又出什么新书了。他收入不高,但花了大量金钱买书,是位好老师。在学期间,老在东方非洲学院主持“伦敦中国讲座”的王斯福教授,也与我形成了相当亲近的关系,他写的一些关于汉民间宗教的著述,对我的影响很大。在英国学习的情况,我两年前的《无处非中》(山东画报社2003年版)一书中写到一点,写得很片面,主要切入点是我为费孝通先生与伦敦经济学院之间关系的一点认

识。我的观感, 里面也谈到了一些。英国学风的特点大家是知道的, 那里的学者特别注重掌握扎实的掌握社会分析和调查的方法, 比较务实。那里的人类学要求我们接触具体的人, 分析具体的人的社会地位和活动, 在这个基础上去解释当地社会和文化, 不像美国人类学那么理论化。我们可以将英国人类学的基本特征形容为“经验主义”(empiricism), 这种特殊的经验主义传统有它的优点, 在理论思考方面也有它的有限性。经验主义把人框死在实际生活的观察里, 使你不能像欧陆或美国的人类学家那么超脱。不过, 在这个传统中, 也训练出了包括费孝通、中根千枝等等在内的优秀人类学家。费孝通在谈到英国人类学训练时给予特别赞赏, 我对此深有同感。而且, 不同的还有, 英国的人类学不像美国人类学那样设四大分科, 主要教授和研究社会人类学, 这个传统是欧洲的。在欧洲, 文明史悠久, 考古学必然有自己独立的传承。在美国, 学者进入的世界整个都是印第安人的, 无论研究什么, 都与人类学有关, 这样便形成了“兼容并蓄”的人类学传统。相对来说, 英国人类学范围比较狭隘, 但这样也有它的好处, 对我们中国的学科建设也是有参考价值的。我们中国与欧洲比较接近, 文明史悠久, 研究文物、语言等等, 都有传统。人类学怎样办出自己的特色? 我看欧洲经验还是可以参考的。

徐: 就是说中国与欧洲更接近?

王: 当下中国人类学机构大多是沿着社会文化人类学的脉络来发展的, 这个脉络, 也是美国人类学的主流, 但不是它本科教学方式。美国人类学教学和研究是有所区分的, 它的教学要求学生把握四大分科(体质、语言、社会、考古)。学生的研究, 可以是多元的, 做社会人类学方面的, 训练与英国相近。在英国、法国则不同, 欧洲的人类学训练注重社会人类学, 要求学生在学习社会文化理论的基础上, 去从事民族志工作, 专业方向分亲属制度研究、政治制度研究、经济制度研究及宗教制度研究四个领域, 也可以延伸到一些应用领域, 如医疗、环境、都市等等。美国人类学家认为英国人类学家将“文化”分为几个部分来研究是错误的, 因为“文化”是个整体。但是, 英国人类学家则主张这种专业化的经验主义训练方式。并且, 传统上, 英国人类学更注重海外研究, 英国国家小, 原来曾是帝国, 对了解世界的欲望很强烈, 人类学就是“国际学”, 这点美国人类学在“二战”之后, 也有类似发展。传统上, 英国人类学的“国际学色彩”, 与我们中国的人类学形成反差, 我们的人类学还是中国学。这点我觉得着有些遗憾。

徐: 你讲的这个对我们很有启发。英国和美国这两大不同的人类学传统, 我们的同学们将来选择

的时候也是会有所考虑的。现在强势的好像在美国, 它的发言权比较多一点, 特别是美国的四大块, 但是中国人类学比较像英国人类学。你说英国人类学是“国际学”, 中国人类学是中国学, 中国人类学到国外做田野的很少。对这一点, 现在我们也有意识了。我们的学生中外语比较好的, 比如我们学泰语的学生, 现在已派到泰国去做田野。而据说广州那边的人类学系将来要把东南亚这一块涵盖进去, 它也需要准备人才, 语言方面很重要, 我觉得你这个讲得非常有意思。这里还有一个问题你能不能和大家谈谈, 那就是, 你在英国所受的博士训练和你在中国所受的硕士训练, 你觉得哪些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王: 我读硕士研究生时, 中国人类学学科还在重建, 80年代提倡人类学的导师们, 基本上是所谓“南派人类学”的传人。“北派”则涉及不多, 主要在社会学中谈, 在人类学中谈得不多。我受到当时的学科建设运动的熏陶, 影响是深刻的, 但我们读的书却相当有限。在少数读过的人类学书籍中, 受到我们崇拜的有台湾李亦园先生所写的一些论著, 及他主编的诸如《文化人类学选读》(台湾食货1981年版)这样的教学参考资料, 都是我们特别爱看的東西。乔健先生后有接触, 但对他的著述, 我们当时了解得少些。除此之外, 我们也读到一些英文的人类学论著, 特别是教材。我当时对心理人类学有兴趣, 读了米德、本尼迪克特、卡丁纳的书, 有关这方面还发表过札记, 很初步, 很粗糙, 但是一种努力。我们到硕士期间, 专业方向属于中国民族史, 这个方向, 厦大有硕士点, 人类学硕士, 则要去中山大学答辩, 我考的是“中国民族史”。因为老师正在推崇人类学, 所以鼓励我们多读人类学书。在学的那两年, 我们主要上的课还是民族史, 这些课有的本科时就上过了。我曾对古越族的历史有兴趣, 学得很认真, 但后来全都忘光了。

1987年10月, 我到伦敦大学报到, 跟老师接触后, 发觉自己所学的已不被承认为人类学。英国的民族中心主义比较严重, 它有一套, 总以为别人的东西不妥。我在厦大在课堂上最仔细读的就是摩尔根的书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些书, 也算是西学之作, 曾对英美人类学有很大影响。但到了我去读博士的时候, 已经被作为历史淡忘了。我课堂发言时, 不小心提到它们, 老师和同学都会露出讥笑的表情, 而老师总是说, 这些都已经是过时, 你不要再看了, 也不要再谈了。直到第一年学习快要结束的时候, 我写了一篇对西方民族主义研究的评论, 作为作业, 文章用到马克思和列宁的观点, 老师读后, 叫我去办公室, 对我说, 你这文章有独创, 给了A, 而且建议今后修改发表。也许我的作

业已表明,本来这些东西之间是有历史关联的,特别是关于国族问题,马克思曾经用阶级理论对之加以批判,而列宁对民族主义的新鲜论述,则可以说是一种“后殖民主义”。但是,时过境迁,人类学家在谈这些问题时,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不去谈对我们来说相对熟悉的理论。不过,从我那篇作业得到好评这件事来看,英国老师还是很开明的,只要你把自己的观点论证清楚,他们就会接受。我在英国7年多吧,此前在中国所学的东西在那7年里,是被压抑的。因为我想,要在英国拿学位,就要使自己的论文符合英国人类学的规矩,要是还照原来那套东西去做的话,学位就不保了。我对这个实际问题是有清醒认识的,但是,我的博士论文写作经历还是很波折。做完田野调查之后,我回到英国,写出论文第一稿,交给老师 David Parkin。没过几天,他召见我,要我重写,然后,他拿出自己的一本书来,解释说,人类学的文本必须是个案研究,不要什么都涉及,意思就是要“以偏概全”。我的民族志调查工作是在泉州做的,受到当地丰富的历史文献的影响,不可能没有历史感。但是,自己写得很笨拙,没有把方志学和民族志之间的关系梳理出来,就随便写论文,挨骂应该。我后来也采纳这个意见,重新写了论文,经过几次修改才答辩。这个经历,对我是有影响的。刚回国时,我就感到中国人类学要往前走,要国际化,要接轨,要切实从经验主义的田野工作方法来补课。所以,我当时写了不少介绍性的东西,都属于是讲座前的笔录,主要针对的便是民族志方法。但是,人是一种复杂的、思维漂移的动物,他会变化。我就是这样。经过一两年教学,我在国内继续接触西方论著,认识更多西方学者,特别是在参与人类学的五届高级研讨班过程中,请来不少外国人类学家。在中国与海外接触多了,写海外的理论也多了,接着我突然意识到这有问题:我们的人类学到底哪里去了?我曾在《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谈到这个问题,但是当时的感觉没那么强烈。这个问题实际可以换个个人化的说法:我原来在国内所学怎么办?这些年,我觉得英国人类学和中国人类学各有特长,而中国人类学的地区差异也很大,不同地区也各有特长。众多的人类学种类怎样互相配合?怎样相互启发?是我今天关注的问题。几年前情况不同,我更关注学科的规范化建设。我最早投稿到《中国社会科学》的一篇文章,注解奇多无比,当时编辑还不习惯看到这种西式的参考文献注释方式,硬要我将其中的大部分删除,剩下零星几条。90年代中后期,《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中国书评》倡导中国社会科学规范化的讨论,我也积极参加,在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同时,主张中国人类学必须是有一

定“语言规范”。这种主张这些年来看多了,大多数学者都已接受,杂志也改头换面了,到处可以看到“匿名评审”这四个字。我这个人有点“反时髦”。在规范谈得太多的今天,我的另一种感受就扩张了,我是越走越觉得中国传统的人文学有其自身的特点,而且社会科学的规范大抵是英美派的,我走欧陆也多了点,读的书也多了点,发现欧陆传统也有自身特点,跟中国的人文学传统比较相近。问题牵涉到学术的帝国主义和学术的地方主义之间的矛盾。学术上也有本土主义啊,这种观点认为我们的学术可以跟外国的学术完全不同。学术上也有帝国主义啊,认为你如果跟我不同,我就要把你灭了。怎么处理二者之间关系?

徐:我很赞成你刚才讲的观点。你曾是我的班主任,我到北大参加的人类学高级研讨班,是二年级才去的,一年级我最后两天才去。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五年级,你当了我四年的班主任。我当时对你所讲的东西感到高深莫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对英国的传统,英国的那些概念和规范接触得很少,而你呢,从英国学了7年回来,你当然有大量的资料,大量的东西在你的脑袋里。你的文章也好,发言也好,对我们(当时不仅是我一个人而且是相当一部分人)很陌生,一个很直接的感受就是“不懂”。当时你的文章也是读不懂,你的文章一出来就是三万字、四万字。你一定很记得,有一篇稿子给我,叫做“超越文化局限,建构中国社会科学”,那篇稿子就将近四万字。我是反复读了多少遍以后,只读懂了前面的序言五千字。所以我后来在杂志上给你发的也是发了那五千字,后面我没有发,这正好说明了什么?正好说明了中国的人类学学术传统和英国的传统有很大的差距。我觉得这几年来,你有一个很大的发展,你的东西一出来,只要我们能买到的,能够看到的,包括你在《读书》杂志上发的,《文汇报》上发的,《光明日报》上的还有其他的,同学们和我自己都是很关注的。我觉得你现在所写的东西,所表达出来的东西,非常重大的一个转折,一个变化,就是我们读得懂你了,不仅读得懂,而且很有味道。举你写的那本书《人类学是什么》。此书的前面一部分,我觉得你把人类学发展史上发生的进化论、功能派这些讲得非常生动,很容易理解,而且对我们今天来认识这两个学派对人类学的地位和作用可以更深入一些。这个转折就正式说明了你对两个学术传统,把东西方人类学的学术体系融合在其中了。我以为你可能起到了这种融合作用,我不知道你自己怎么看的?

王:这个也不敢当。你刚才批评的我也该自我批评。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变化是正常的。你在某一个阶段,会觉得你没办法脱离某种文风,本来应该说得更清楚一点的,或者说文字应该更汉语化点,结果变得不三不四的。对这点我觉得应该自我反省。后来,我之所以有那么些小文章,也是有一个过程的。我可以硬着头皮碰到一些东西之后,才对它们有体会,现在将这些体会表达出来,如此而已。

徐:你在英国7年多,回国后又做了11年工作。从我个人的观察来说,你对人类学大体上有一个消化的过程,而且正在不断地产出,对人类学的中国研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这些“反吐”出来的东西,应该就是建构我们中国人类学非常重要的材料。能像你这样做的人,我相信今后一定会越来越多。

王:这又不敢当了,但是自己要是没有这种理想,那就不可能这么写东西。若说我有什么变化,那么,这个变化一方面原因是个人的,我刚才提到了这点,另一方面的原因是“外在的”,大家知道对我有不少批评者存在,他们促使我更清醒地认识自己,认识这个学科该怎么做。此外,包括我对别人的批评,也可能对我自己是一种推动。

徐:我觉得批评的声音是很正常的,人类学本来就是一种批判的眼光,难道我们就可以批评政府而不能批评我们自己?

王:是啊,所以说学术是在互动中前行的。不过,这样说也太正经了。其实,我这些年能多写小文章,也许是由于不再需要评职称了,过去想成教授,要多发表所谓“核心期刊”的论文,现在成教授了,没有必要去凑热闹。这样一来,我便有了机会来任性书写,而且有机会通过个人的记忆,回过头去想以前的事,突然觉得“我自由了”,不像原来竭尽全力地去写一些东西,更为个人化地去想象,想象我想象中的中国人类学应该是什么样的。

徐:那你想象中的中国人类学应该是什么样的?

王:我们想象中的人类学到底应该是什么?各家就有各家的说法。对我来说,蔡元培的想象,吴文藻的想象,都是我的想象。我读了他们的东西,觉得深受启发。中国人类学后来发生的变化,让我觉得不太满意。20世纪初期中国人类学的想象,第一是认为我们古代有这个传统,第二是认为古代的这个传统可以跟现代西方的传统结合起来,第三是认为中国的人类学传统不是局限于自身研究的,虽然我们暂时要研究自己,但是,包括费孝通先生晚年的一些作品在内,都还是说我们要的是一个放眼世界的学问。这三点在老一代的学者当中,包括林惠祥、李安宅,不只是吴文藻、蔡元培,都是共通的,而且从这三点出发,中国人类学产生了一些具体实践家,他们也是这么去实践的。比如说李安宅,他也会去海外

调查,李亦园先生的人类学生涯,其中的主要一章,也是东南亚社会的人类学研究,他最近也说,中国人类学要先从研究“异文化”开始。此外,乔健先生也是一样。费老早期写的《美国与美国人》,也属于有想象力的作品。但我觉得不满的是,随着历史的变化,20世纪中国人类学逐渐把人类学内部化,国家化,将它变成只是关注国家建设的“学问”,而并不是一种具有世界关怀的学问。最近我把这方面的想法梳理了出来,受到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社会学学院研究生会的邀请,做了一次讲座,题目是“寻找中国人类学的世界观”。在讲座里我提到,我认为中国人类学有三个圈子要研究,第一圈就是核心圈,过去叫做乡村研究和城乡关系,第二圈,即少数民族研究,这片广大的土地,历史上是自治的,或者是由土司“间接统治”的,跟中央朝廷形成朝贡关系,第三圈就是有的跟中央朝廷有朝贡关系,有的没有形成这种关系,但是对这个圈,史书上有丰富记载,外国的风物、民俗、人情,这三个东西,在古代中国都是有记录的。我对第三圈给予特别强调,是因为无论是城乡研究,还是民族研究,传统我们都继承下来了,前面一种变成乡土中国人类学,核心圈就是这个,第二圈就是民族学。古代中国曾经如此辉煌的海外博物志,到了近代以后就式微了。为什么?因为我们从天下主义,转型成国族主义,使自己的知识内部化了。我以为,第三圈对未来中国人类学视野的拓展至为关键。诚然,我们不只是要从事海外研究,而是要在一个天下主义的观念指引下去思考人类学未来的走势。要先有这个想法,才能做好海外民族志的调查。

徐:你刚才所说的你想象中的人类学,我觉得还是在说历史上的事,那么现在应该是什么样的?

王:现在的中国人类学应该也有其自身的特点,而这个特点事实上也是与国际接轨的。国外的人类学也是这么想象的,它想象一个世界,然后再想象人类学者在这个世界中的位置,有点像费孝通先生说的“文化自觉”。我们中国学者也不是没有去想象我们在世界当中的地位,不过我们的特点是,一想到这个,我们就想到过去受到外国欺负的历史,所以知识分子觉得自己的使命,是通过认识自己来拯救自己。人类学就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下,变成了“中国化的”人类学。但是,到了21世纪,情况已有所不同了。我觉得中国人类学应该对中国世界观进行重新思考,先要有一个比较远大的历史观念,而不应局限于经验主义的村庄研究。研究村子,很重要,作为训练学生的方式,是可行而且值得提倡的。但是,你若是把所有眼光局限于这个村子,把它说成是人类学的一切,我觉得不是一条有前景的路子。我最近的《走

在乡土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开篇就在说村庄研究就等于人类学。总之,我的意思是说,人类学要有历史的想象力,在这个基础上,学科还要做许多方面的工作。其中一项,依旧是把人类学的一些观念原原本本地梳理出来。而这项工作,过去半个多世纪做得不好。到底中外人类学的观念怎样梳理?我们学科史方面的工作不是做多了而是做少了。10 年前我开始在北大开设人类学课程,主要讲人类学的基础理论。1998 年以来,我特别重视人类学的学科史和海外民族志研究,提议在北大开设这两门课,到现在我们还没开出来。学科史我前面已谈到了,海外民族志这门课设想的意图,是让学生多读些有关海外的文化研究之作,为他们今后到中国以外的地区去从事人类学研究做铺垫。1998 年以后,我还多次参加法国跨文化研究院的会议和研究,以为中国人类学有必要研究中国以外的地区,包括欧美,也将这个观点提出来讨论,得到了一些同行的支持。最近我把有关中国世界观的观点发表在《年度学术 2004》(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上,也写了一篇叫做《天下作为世界图式》的文章,讨论我们的天下观念。你们可能会认为,我这样说有点不切实际。现在中国人类学鼓励扎扎实实的田野工作还来不及呢,还有什么精力来谈世界观?也有朋友善意地批评说,我所谓“世界观”的论述跟 1997 年出版的《社区的历程》(天津人民出版社)文风大变,而且是变坏了,很抽象,宏大叙事太多,想把中国人类学做成世界史。我同意这种批评,但又觉得只有把中国人类学做成中国眼光中的世界史,中国人类学才有一席之地。我觉得这个也是符合国际的人类学想象的。我们知道,人类学曾经就是人类史,到了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后殖民主义在批评西方世界体系时,人类学也起到关键作用。刚去世不久的埃立克·沃尔夫(Eric Wolf)这个人,就写了《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们》(加州大学出版社 1982 年版),这本书就是一个人人类学的世界史。我们为什么要欺骗自己说,人类学就是那些小不零丁的人家不要的东西?我们人类学为什么不可以有自己的世界观?我们人类学为什么要局限于那些笨拙的模仿?为什么要忘记中国古史上宏大的叙事?为什么要忘记了人类学本身就是一种世界叙事?我们这个学科到底能对其他社会科学有什么启发?

徐:你讲的知识体系定位问题,对我们有了新的启发。那么,人类学的宏大叙事能够在其他社会科学中起什么作用?为什么这么多学科要在人类学里来找理论和方法?而为什么它们一旦来找的话,都能在自己的学科里有所发展?像徐新建、杨念群他们搞的文学人类学、历史人类学最近都出来了。现

在也有分子人类学,复旦大学搞的,他们致力于用分子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人的起源和变化。这个问题说明在人类学实际上它的地位是基础学科,也说明了人类学引起的跨学科互动越来越发达,越来越频繁。这种说法不知道你接受与否?

王:你提到的几个观点,是对我刚才的修正和补充。一句话不能说清楚所有问题。人类学迄今已经发挥了不少作用,在学科的合作方面,对其他学科的启发也越来越多。我刚才说得有点暗淡,也许是错误的。实际上,我以为今后人类学对其他学科的启发应该更大、更深,目前的启发是一种浅层次的现象。比如说,有不少其他学科的人邀请我去讲怎么研究村庄,他们以为人类学就是研究村庄的。我讲的村庄研究,当然对别人是会有帮助的,但如果说这对别人有什么启发,那么我觉得正是浅层次的启发,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的事儿。应该有一些更深的,比如说认识论上的启发。人类学对中国社会科学的总体启发应该是更广的。我在上课时一直讲,人类学到底有什么独到的本事?我的答案是,以往中国社会科学在进行调查研究时,采用的是一种客位的研究方法,而且这种方法往往跟政治任务结合在一起,使社会调查变成一种社会支配力。人类学提倡的恰恰跟这个有所不同,我们主张的是主位观点,这对解放中国社会科学的思想,将有重大作用。人类学主张走向田野,用主位的观察方法,整体的方法,反对把老百姓的生活切割开来的“分析”,用比较的,而不是自我限制的眼光,等等,这些都是人类学的看家本领,本来也应该是对中国社会科学有启发的。然而,人类学在向别的学科宣讲这些观点时,好像给人一种误解,让人以为人类学等于村庄研究,不管汉人还是少数民族,你去了村子就叫人类学家了,要是你是做大规模社会调查的,你就不叫人类学家了,这实际是有误会的。我觉得我们对这个问题还是应该有更多的对话。而你刚才说的那个牵手关系是应该有的,十几年来我也交了许多朋友,行内的朋友有一些,行外的朋友更多,包括政治学、哲学、历史学都有。至于你形容的“牵手关系”,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先让别的学科了解人类学的主要宗旨,让别人承认我们的作为是有意义的,说你存在,才可能谈联合。但人类学不能自闭和自满。

徐:站在客位角度,你认为人类学应该走向别的学科,我站在主位的角度,我认为人类学是中间的,是一种“牵手现象”。

王:我也同意你说的,以前学生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提到一个现象,即其他学科,包括你刚才提到的历史学、比较文学,还有法学,它们所做的人类学研究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比我自己,或者其他很多

人类学同行做得都要精彩, 为什么?

徐: 他们有其他学科的背景啊。

王: 他们有学科背景, 是啊, 不过, 我以为, 更重要的是, 他们对人类学的钻研简直是比我们行内的都要勤奋, 我们行内满足于现状。你看朱苏力对法律的研究, 就是一种典型的法律人类学, 他研究“送法下乡”, 关注乡下人自己的习惯, 自己的人情, 与这种下乡的法律的差异与关系, 关注现代和传统之间的紧张关系, 实际就是关注法律人类学。苏力也看我们的东西, 特别是费孝通的《乡土中国》, 他觉得《乡土中国》有一段话就是他们做法学的基础。什么呢? 那段话叫“无讼”, 很精彩, 短短的一段话, 说明了法律人类学研究的宗旨。乐黛云老师做比较文学研究, 她不仅研究中国, 还用中国眼光来看各国文化, 指出中国文化替世界提供了“和而不同”的观念, 这对于世界文化关系的处理, 是一个贡献。她跟汤一介老师, 都是我的老师辈, 对我的启发也很大, 对我也很关照。

徐: 也就是说, 中国人类学发展的空间还很大。

王: 中国是“世界的中国”。我们有一个杂志, 错误地叫做《中国与世界》, 好像中国与世界无关或中国与世界相区分, 我觉得中国即为世界, 至少在观念上是这样。任何民族就是一个世界, 你不能生硬地去切割它。人类学的这个观点早就有, 你研究一个小小的部落, 小小的民族, 不将它当成一个完整的世界, 研究就没有趣味。特色重要, 但重要性在于这个完整的生活世界, 引人想象, 使我们意识到人类是怎么共同生活的。纠缠不同文化的地方性特色, 并非人类学的最终追求。

徐: 你能否用更清晰的表达, 说说人类学的看家本领, 它的独到之处究竟何在?

王: 刚才我们已谈到一些了。我觉得人类学者要“成丁”, 成为一个人类学的“壮丁”, 要有三种素质。首先, 我们要成为参与观察家, 混迹于各种游牧的或者是定居的民族当中(甚至是自己的亲戚当中), 从参与生活来观察生活。其二, 在观念上, 我们要暂时忘记我们该怎么解释被研究者这个问题, 而更重视了解被研究者是怎么解释世界的, 这个叫“主位法”。第三个呢, 我觉得是“整体主义”, 我们不认为一个群体的生活的某一个别方面是可以单独研究的, 我们认为只有对它的整体进行研究之后, 你才能看到其中的某一点的意义。人类学家要“成丁”, 必须把握这三点。但是我们也不应忘记, 人类学不只这三点, 若只是这三点, 那你成了丁, 就没什么大前途了, 老用这三个原则去打棍子、敲棒子, 那不好。我们人类学还有一个看家本领: 我们是比较。人类学的任何作品, 先是地方性的, 但这种地方性的视野

是世界性的, 因为地方性恰是在比较中突现出来的。比较并不是要乱比, 而是有它的规则。当下的比较时常碰到的一个问题, 那就是, 不同民族不是相互隔离地生活, 而是通过世界化或全球化, 相互接触的。在这个“文化融合”的时代里, 怎么样进行比较? 今日人类学在谈比较的时候, 因而便要谈文化接触的历史, 文化关系的历史。我觉得这一块在中国以往的人类学里面, 是留给外学科的学者去做的, 今天特别有必要把这项我们的看家本领要回来。这几年, 我组织翻译了一些历史人类学的书, 我以为这是初步铺垫。1998年, 我开始想谈中国人类学的“三圈论”, 特别重视海外民族志的研究及跨文化比较。由于财力极其有限, 因此, 这方面谈不上有什么研究, 我的博士生和硕士生还是在境内培训, 还是培训前面二圈的研究。我要求学生把参与观察、主位观点、整体论把握了, 用它们去调查, 再提出一点看法。我自己在《无处非中》一书中, 试图用游记的形式表明, 中国人类学家要研究海外文化。

徐: 对, 我觉得我们应该走出去国门去研究。

王: 中国人类学的海外研究, 应该有更多的人参与, 我们可以先从周边地区开始, 东南亚是理想场所。不过, 我自己的理想是出现一个中国对欧美的叙述, 他们长期把我们当成研究对象, 对我们的论述和评论也很多, 影响着我们看自己的方式。我们如果倒过来研究欧美呢? 他们当中也不乏有稀奇古怪的事物, 比如, 他们的殡仪馆、婚礼、送礼, 跟我们的有什么不同? 对生命和死亡的态度有什么差异? 历史的脉络与我们相比怎样? 他们的社会是怎样构成的? 再说, 我们总以为人情这一说是中国人的文化, 但就我所知, 英国人也“走后门”, 只不过没有这个说法。人类学史上也很多人谈到, 西方文化也是在民俗和宗教的制约力量下成长起来的。

徐: 我们在海外研究方面受到的限制很大, 一个是语言上的, 一个是财力上的。我现在叫一个学生到泰国去做田野, 首先是因为她语言能行, 然后呢, 到泰国去费用不是太大, 那还好办。如果你说到美国去或加拿大去做, 那费用就高了。但是从长远来讲, 你讲的“世界的中国”, 意思是说, 海外对中国的认识, 是一个方面, 中国对世界的认识又是一个方面, 这两者如果缺少任何一个, 整个中国的人文世界观都是不完整的。

王: 我一向有这个看法。比如说《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一书是写外国人怎么看中国人的, 而现在我谈到了有关“天下观”的问题, 涉及到我们中国人过去是怎么看外国人的。我们在这方面有什么传统? 我觉得有传统, 甚至到近代的时候, 如魏源、康有为、梁启超, 都到外国旅游, 写了很多有关著作, 特

别是发达国家的稀奇古怪事物, 他们的游记很像人类学。我在“天下作为世界图式”一文中提到, 中国有一个持续的世界解释, 这个解释近代以来被我们自己压抑了。我们今天的社会科学一直是在引用外国人的观点来看自己, 用自己的眼光看他人的不多。我这样说有点过分, 好像要传播一种中国中心的世界观, 实际不是, 我的兴趣在于寻找不同世界观的共通之处, 我也知道人类学主张“从当地的观点出发”, 这要求我们现在去做海外研究, 不能简单采取中国中心论, 也不能简单采取西方的概念体系, 要先从当地事实出发。古代中国对“他者”的认识, 还是有华夏中心主义的色彩, 那些古书里讲的“怪事物”, 所谓的“怪”标准是我们自己定的。现在要做民族志, 不能简单借用古人的那一套博物志方法, 那套方法使我们意识到我们曾经有过海外研究, 但新的海外研究, 还需要新的探讨。另外, 我也需要强调, 到海外去研究, 若是简单搬用西方现存的概念体系, 也是不可取的。比如, 西方人类学家对东南亚的研究是有成就的, 值得我们借鉴, 但我们还是要用中国的文字书写, 这里牵涉到怎么开拓“汉语人类学视野”的问题, 不是简单的占有更多的研究对象的问题。无论是海内还是做海外, 我以为我们还是要先有一个对中国世界观的想象, 我相信这是我们当今的重要使命。以后要怎么做我就知道了。

徐: 民族院校最大的毛病在于, 认为自己是民族院校, 把民族学抓住, 把少数民族研究这块抓住就行了。这样恰恰限制了自己的发展。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国家民委在不遗余力地发展人类学, 而到了民族院校, 它说我们不能放弃民族学。这样, 人类学往往被边缘化。你多年来在北大工作, 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想法?

王: 北大是一所“国立学府”, 本来在北大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多是汉学。研究外国的都是搞翻译的, 这个与我理想中的北大也不同, 甚至不符合“大学”这个概念。我以为 University 首先要 Universal, 也就是有普遍关怀, 才算得上 University。北大文科也有点像是个中国学学院似的。你提到民族院校的问题, 我不太了解, 但我猜想问题可能就更不用说了, 因为这些院校是国家在某一个时期为了培育少数民族干部而设的, 到 21 世纪, 这些院校显然还会存在下去、发展下去, 但是教学和科研的宗旨, 一样也可以更改, 怎样使大学 Universal 起来? 怎样使少数民族 Universal 起来? 不要使他们得到培养以后, 就陷在地方和族群内部去了。现在大家纷纷改成“民族大学”, 而不是“民族学院”, 这个潮流应该还是积极的, 走向“大学”, 意思在学理上还是正当的。

徐: 人类学具有人文关怀。这么多年来在人类

学的应用上, 我们都是很艰难地在做, 但是现在“以人为本”变成一个流行词, 这个本来是我们人类学学科根本的价值取向, 现在变成一个流行词, 大家做什么事情都要以人为本了。在这个情况下, 我觉得我们人类学的发展空间更大了。你对此是怎么看的?

王: 人类学者对这个提法的确应该回应。作为个人我不喜欢揣摩政治领导人的意思, 不过我看“以人为本”这个提法有点像“民生”的意思, 是一种对社会的积极态度。而用“以人为本”来看我们人类学的话, 则要谨慎。“以人为本”可能已被理解为一种以人的利益为中心的发展主义意识形态, 它的导向是人的利益(并且时常是个人的利益), 而不是人的整个世界(包括自然)的利益。

徐: 那就错了。

王: 是啊, 比如说环境问题, 可能与“以人为本”的观点有关, 而我们时常将它们混同起来谈。人类学的贡献之一就在于指出人和环境是不能分割开的。以我的观点看, “以人为本”便是以自然为本, 我们的政策制订者已渐渐意识到这点了。人类学如何对此回应呢? 我觉得人类学对世界各民族, 特别是原始部落的研究, 对我们的现代社会的启发最大, 这些研究表明来自于西方的现代社会存在问题, 在“以人为本”中把“自然”两个字抛弃掉了。

徐: 去年我们在银川开会的时候, 李亦园先生做了主题演讲, 他谈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我们后来在他的主题演讲基础上发展出一个生态宣言, 主张在讨论“以人为本”的时候, 应注意人与自然的关系, 这恰恰是我们人类学家应该做的事情, 或者是应该来宣传的事情。如果我们现在仅仅是强调“以人为本”, 把它变做一种人类中心主义, 那自然怎么办? 你把自然的位置摆不对的话, 反过来它会害了人类, 像海啸, 非典, 艾滋病, 都是。

王: 是啊, 这争论很大, 但也表明人类学做的工作是值得赞赏的。涉及环境与历史生态, 一些人类学家做三峡研究, 采取的角度本来很值得社会关注, 遗憾的是, 没有得到足够重视, 问题蛮大的。从人类学角度, 对于环境问题, 对开发提出评论, 已有一些成果, 这些成果表明, 我们在摧毁历史的过程当中, 也摧毁了我们自己。对于这种所有主流的“建设”, 民间文化自有它的回应, 人类学家因而更关注民间文化。不过, 遗憾的是, 现在人类学者在某些地方有一种不让我看好的做法, 就是说参与到旅游开发, 参与一些文化破坏性的项目, 而没有对开发计划对当地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的影响进行评估。

徐: 现在提出“科学发展观”, 比原来的提法总是要好点了, 最近也出现“环保风暴”, 出现了对水电站建设的评估, 年轻的人类学者肖亮中为了虎跳峡付

出了自己的生命……人在整个宇宙中来说是渺小的, 人类学的世界观对大家非常有帮助, 它不只是人类学家所有的, 而应该成为全人类的一种共识。

王: 应该是的, 作为一种评论, 人类学是有价值的, 我们应该有这个自信, 但也不能强迫大家都来相信我们, 如果大家来相信了, 那也不好, 变群众运动了, 像是谁号召的, 如果说主席说“人类学好”, 大家跟着喊口号, 那也不好啊。

徐: 我学人类学是因为有兴趣, 相信学科对大家都有用处。一个有用的学问, 为什么不去学? 不去推动它? 越多的人知道, 素质就会越高, 越文明。如果干部不懂, 就不会对人有那样的关怀。做学生去学, 你能增长你的生命, 黄金的时间你不去好好学, 就很遗憾了。作为一种宏大的视野对大家的用处, 与目前人类学所处的地位当然是很不相称的。可喜的是, 现在一些边缘的地区、边缘的学校、边缘的刊物都在做。

王: 这很重要。不能忘了中国人类学向来有地区性差异, 我们每个地方都有一批人类学家, 研究也各有特色, 所谓“主流”和“非主流”之说不一定妥当。我最近到四川去, 到那一看, 发觉那里历史上的人类学家很多啊, 而广西呢, 我相信也是有的。无论如何, 就说“南派”吧, 厦大、中大、南京这一脉的, 我觉得老一辈学者的贡献都是很独到的, 但今天被忘记了, 继承得不够。又比如广西, 你现在做的工作, 也是一个必然的阶段, 但还是一个地区性的人类学研究。中国有整个欧洲那么大, 你不能说它只有一种方式, 应该有“百花齐放”的景象。

徐: 你说人类学家需不需要激情?

王: 自然是需要激情。这个世界的当前走势, 跟人类学的理想走在相反的方向上, 你要是没有激情的话, 你就觉得没有必要做这个。当今世界的一般理想, 与人类学者的理想, 有鸿沟, 你要在世界中谋得更好的出路, 那最好跟人类学反着来, 才能挣更多钱。但有钱不一定生活得更好, 人类学家耗费了许多精力去论证这个观点, 要做这项非常的工作, 人类学家需要高度激情。

徐: 在人类学中, 批评这个东西非常好, 但是我们用得很少, 也没有好好用。实际上用得好的话呢, 可以促进我们学科的发展、学习的深入。你是在批评之中成长的。人类学难道还怕别人批评? 如果说你做得不好、不完善、不妥当、不够全面的, 在别人的批评当中可以发展嘛! 就这个问题你能不能谈谈你的看法?

王: 我当然有体会。这些年我受到了不少同仁的善意批评, 获得许多教益, 我是不是进步了我不知道, 不过我特别相信, 健康的批评起的作用是正面

的, 值得被批评者感激。不过, 按我的理解, 你刚刚所说的, 好像更多的是针对整个学科的批评态度。如果是这样, 那我觉得我们在批评这方面做得还不够。对于我们这个学科, 我们要自我反思和批评, 这样才能知道工作怎么做得更好。而我们在人类学批评(critique of anthropology)方面, 做得更不够。我们的研究实际也有积累, 但是对社会问题、文化问题提出的评论不够。最近一些城市建设方面的规划专家、建筑师, 他们的批评令我很感动。比如说, 最近北京的一个记者把北京拆城的过程写得如此的悲壮, 收集的资料如此的用心, 让人感动。另外, 一些老先生提出古建筑的保护观点, 与人类学者有关人文世界的阐释是不谋而合的。他们说得很尖锐。拆城的历史, 拆民居的历史, 跟我们“继续革命”的历史是相关联的。这批学者有胆量在这个时代提出来, 对社会的影响虽然很局部, 但他们做的贡献是巨大的。费老故乡附近有一个叫周庄的, 现在已经很混乱、很糟糕了, 因为一些乱七八糟的新建筑在向它靠近。当时在盖新建筑的时候, 同济大学的一个老教授, 竟然躺在地上, 说要让推土机从身上压过去, 让我感动啊。可惜, 现在已经为时太晚了。我说很悲壮的, 意思就是晚了。中国历史就这样被拆毁了。人类学在这方面做的工作, 刚才提到了一点, 不过让我感动的人并不多。人类学无论是对殖民主义, 还是对西方中心主义, 还是对国族主义, 都具有一种批判的作用。我和蓝达居合译过一本叫《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北京三联书店 1997 年版), 这本书综述了有关做法。中国的人类学评论做得少, 为什么呢? 现在的政府也是希望“百花齐放”的, 能通过评论把“改革”这个路铺平, 做好, 是好事。难办的可能是有学者说的“知识分子的自我监控”, 或者说“互相监控”, 我觉得可能是这种监控压抑了我们自己的批评声音。我们怎么样找到一个办法, 来对人类学的评论, 人类学对这个社会、这个世界的评论, 我觉得是务必探讨的问题。以前谈的是“应用人类学”, 现在这种东西基本上已成为人类学者在参与发展计划中求资助的一种手段, 很难成为人类学评论。目前人类学评论不发达的原因, 关键还是对学理的深层次把握不够。如果人类学者已通过阅读和研究, 形成了一种对学科的信念的话, 那我们就会不会随便放弃某种观点, 附和时代。但是, 我们可能还没有形成这样一个信念, 我们五花八门, 哪有什么人类学的信念? 当然也不是说要有一个支配性的语言, 而是说至少我们有一个基本的共同信念。

徐: 你在北大教授社会人类学, 而北大社会学发展得比较快, 你觉得我们应从中汲取什么好的经验呢?

王: 这有些历史背景了。社会学的实用价值是被认识得比较快的, 对于民族研究的实用价值的认识得也发展得很快。但你一提到“人类学”这三个字, 人家就会怀疑这个东西是培养管人事的人才呢, 还是培养一些好玄想的哲学家? 这个谁都说不清楚。包括学生, 现在也把握不清到底人类学培养出来有什么用? 对社会学的重视看来是自然的事, 社会学也因此得到了比较快的发展。社会学的学科发展, 费孝通是主要当事人, 当时中央领导请费先生把社会学搞起来, 他老人家就搞了, 势头比较好。可是, 单谈学科的膨胀也不是办法的。几年前, 费孝通提起社会学学科重建历程时, 提出“补课”一说, 就是说中国 20 年来社会学的发展是“速成”的, 是没有很好的基础, 所以到现在的使命就是“补课”。你刚才说社会学比人类学发展快, 我觉得快有快的问题。“改革”初期, 人类学是在南方作为一种民间运动发展起来的, 当时的学科提倡者创造了一种氛围, 他们还往北方推广这种氛围, 但比社会学而言, 得到的政府关注还是比较少。实际上, 我们谁都没有对中国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学科力量进行过比较研究, 所以没法得出结论。不过, 你说的也许是对的。人类学和社会学一样, 要得到社会的关注, 得到政府的关注, 才能发展。而现在人类学为什么没有得到关注? 前面说到一些原因了, 原因可能还有很多, 比如, 社会学的声音比我们多元。社会学中有一些学者专门从事调查研究, 而还有另外一批人是“名嘴”, 很会讲话, 在媒体上发言很尖锐, 针对时势, 对大众了解社会学是有推动作用的。相比而言, 我们人类学不是这样的, 比如“名嘴”少, 我们对社会问题也不如社会学家那样敏感。

徐: 你的那本《人类学是什么?》, 很多同学都看过。

王: 写得不好。

徐: 后面部分跳跃性太大, 前面写得很好。你应用更简练的语言有一个归纳。我觉得你没有这个归纳。那你今天能不能在这里归纳, 人类学究竟是什么?

王: 在西方社会中一般人的印象很简单——社会学研究自己的社会, 人类学研究别人(特别是异族)的社会。如果你见到一个美国来的学生, 你问他社会学与人类学有什么区别? 我敢断言他一定会说, 社会学家都是研究美国的, 而人类学家是研究美国以外的。一般人的印象不一定准确, 但至少目前的状况的确是这样的。我认为, 在中国, 要建立人类学, 先要有一个他者的眼光, 这在方法论上有意义, 它鼓励我们站在对方的观点来看世界。

徐: 我觉得人类学不仅是社会科学的基础, 也是

包括所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在内的人类知识的基础。很多人类学家本身他不是从人类学出来的, 而是搞实验的, 搞化学的, 搞医学的, 包括人类学最早的古典进化论, 都是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来的, 后来的新进化论只是技术化了。现在分子人类学和医学人类学都在发展, 都离不开这个东西, 包括将来我们的生物化学, 这是纯粹化学。但是现在的化学和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太密切了, 这两天媒体关注的“苏丹红一号”真是到处都有了, 开始讲中国没有查到, 现在麦当劳有了, 肯德基也有了, 都是用亨氏的辣椒酱, 那不是问题就来了吗, 现在又说塑料的保鲜膜接触食品也是致癌的, 那怎么办? 昨天我太太听电视里面讲, 那微波炉不就是用保鲜膜来搞的, 那不是不敢用了? 化学人类学今后可能还要发展, 它涉及到人类行为, 又比如白色污染, 不是化学的吗? 物理也是一样, 包括机器人出现将来会怎么样? 它对人的生活会怎么样? 所以我觉得人类学是一切知识的基础。就因为它是基础, 别的学科到了一定时候一定要找人类学来解决它们的问题。

王: 知识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主要标志, 人的特点就是有知, 在这个意义上人都是一样的。所以你说人类学是一切知识的基础, 那也没错。你后面讲到的情况很重要, 现在有一种叫“后人类状况”的说法, 意思也许就是说人类即将成为历史的过去, 因为他们创造出来的东西逐渐在支配人自己, 包括克隆人, 给我们过去的社会形态即将带来的挑战是巨大无比的, 而食品方面, 转基因技术的推广, 也造成了许多问题。我想克隆人的最大历史破坏性, 就是使社会的组织基础亲属制度失去原来的重要性, 而转基因食品会改变农业的性质, 使人更远离自然界。再如同性恋, 能使性与生育彻底脱钩, 今后怎么发展, 还不知道, 机器人的挑战更大。这些都是值得关注的课题。

徐: 这些的确值得我们关注。

王: 人类学家实在应当关注诸如此类影响人类生活的新技术, 比如上面说的转基因, 有关它的讨论很多, 人类学者可以研究转基因对人类食物结构的挑战。人类学研究过狩猎-采集社会, 研究过食物生产社会(农业社会), 转基因与这些社会形态有何不同? 值得探讨。另外, 有关这种食物生产方式的众多讨论, 也值得我们梳理。另外, 中国到底要不要接受“克隆人”? 在什么程度上接受? 接受后会有什么影响? 海外的情况如何? 人类学也可以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我们不是生命伦理学者, 也不是生物技术研究者, 但人类学的眼光是有用的, 我们可以研究这些东西对于人类的影响, 以及研究人们看待它们的方式, 通过这些研究, 来提供跟科学家不同的见

解, 科学家的研究目的性很强, 人类学家则注重解释和辩论, 对于人文世界的生态, 人类学家保持着某种敬畏之心, 这是特别可贵的。什么是人文世界的生态? 我以为张光直先生在研究中国文明史时说到的, 中国文明史的绵延性代表的大多数非西方、非近代文化的特征, 这一特征现在是“非主流”的, 但我觉得不能丢了。我们在 20 世纪中之所以有众多损失, 是因为丢了这种绵延性。人类学也一样, 不能丢掉这种绵延性, 丢了那学科就完了, 以后学生都去考那些生命技术学, 舍弃人类学。

徐: 我很同意站在人类学的立场去关注新技术对人类有什么影响。

王: 是啊, 这点特别重要, 因为别的学科不太关注。

徐: 还有转基因问题, 现在国外产品都明确标示出哪种食品是转基因的, 哪种不是。我们中国就不给你标出来。我们现在搞的转基因食品究竟对人体有好处还是有坏处? 包括现在水稻都要转基因了, 有些搞这个技术的人, 他就希望成功, 搞成功就推广, 以后就全部是转基因的食品, 种的大米都不是农业生产的, 那另外一些人就反对, 那有的说掌握这个技术掌握这个公司, 将来发财, 就是他们的钱。这都是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作为人类学者, 应关注它对人类的影响, 关注人怎么去应对这种新东西。搞技术的总是希望他的技术发展得越来越快才赚得越多, 个个都是大老板。关于这个你能不能再谈谈?

王: 这个我懂得太少, 讲不出什么。

徐: 没关系, 没关系, 我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你。你人类学从硕士读到博士, 我觉得你是“土鳖”加“海龟”, 双重身份, 我自己也是在学人类学, 我自己始终在学习, 因为自己年纪大了, 学力上、精力上、背景上都比较薄弱, 我现在又要教学生, 带硕士, 带博士,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很重要: 很多学生都是别的专业转过来的, 人类学入门的“门”到底在哪里?

王: 中国人类学基本没有“门”, 如果有, 那基本上就是研究生的入学考试。我们目前还没有完整建立起人类学本科教育, 研究生教学也还不够完善。在当前情况下, 从研究生开始的, 去定义人类学的门槛, 努力做了很多, 比如, 编教材, 开讲座, 做田野……

徐: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学人类学的“入门”。

王: 噢, 是怎么学吗? 问题很大。在美国, 人类学博士学位大概要 7 年以上才能拿到, 而英国的也不短, 英国理科是很快的, 文科却是最久的, 基本要 5 年, 所以按国际上的情况, “入门”其实不易。在英美读人类学, 学分跟其他学科都一样, 但人类学研究

生要读的书, 可能还要广泛得多, 其他学科要读的社会理论和历史, 学人类学的, 也要读, 但学人类学的学生要读一些其他学科不读的东西, 然后, 一般研究生还要做一年以上时间的田野工作。外国人研究异文化, 需要两年, 其中第一年是习惯当地语言, 第二年才是田野工作。这些都过来了, 你还要写博士论文, 需要一年到多年。之后, 这才叫“人类学家”, 或“人类学者”。要称“家”的话, 我们国内的要求更高。我的意思是说, 在国际上, 人类学的门槛是比较高的, 可是这个学科又很麻烦, 它让人觉得门槛高又没什么用, 对不对? 不过, 外国人这么想的人很少, 他们还是靠兴趣学习, 教育体制也比较灵活。相比而言, 国内定义“人类学门槛”要低得多, 我们很简单, 就是研究生考试, 考进来了就培养, 出去了就随你便了。

徐: 那一个初学者学这门学科, 这门知识需要怎么样学呢?

王: 读一些经典的社会理论, 这是第一步, 如果不读的话, 调查也许是白搭的, 如果读了的话, 他的调查, 他做的一个民族志调查, 会做得好些。在调查以前, 更要读人类学经典。民族志调查, 是人类学的成丁礼, 要做一段长时间的参与观察, 在别人的生活当中找我们对生活的感受, 所谓“别人”是广义的名词, 不一定指的是外国人, 当然外国更好, 更易让我们产生好奇心, 有助于研究。第三是要学会书写, 人类学家实际上又要是个作家, 你要“写文化”, 这里“写”字是关键。读、走、写, 三种技术要结合在一起, 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我觉得自己是一个结合失败的例子。人类学大师都可能成为文学史上的大师, 马林诺斯基、米德、列维—施特劳斯这些人在西方文学史上也是很牛啊, 列维—施特劳斯在世界文学上应该是前 100 名的, 这个不容易啊。我的意思是说, 其实人类学门槛很高, 像我这样不能很好地将读、走、写结合在一起的人, 只有在门槛低的情况下, 才能称是人类学家……

徐: 你太谦虚了。

王: 不是, 非常遗憾, 我说的是真话。我觉得费老有许多值得学习的地方, 他的观点, 田野, 散文, 都很精彩。

徐: 我还是想请你具体地讲一下学习人类学的要害在哪里? 人类学的入门的“门”在哪里?

王: 学人类学像学音乐一样, 要“会”很容易, 但要演奏得精彩, 门槛则很高。学习者要先知道, 人类学可以是社会科学也可以是人文学, 先要做这个区分, 另外在学习人类学时应知道人类学有一个共同追求的东西, 我们追求的是去解释所谓“超过个人相加起来的总和的那部分”, 这有时候被表达为“社

会”, 有时候被表达为“文化”。要解释“超过个人相加起来的总和的那部分”, 学人类学的学生第一是要知道人类学大多是反对功利主义哲学的, 就是反对个体主义方法论的, 它的基本观点, 与当今国内流行的经济学相背反, 经济学家以为理性的个体是社会科学解释的基础, 人类学家则相反, 他们认为, 这种个体主义的论调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在人类学家的定义中, 人即为社会, 即为孔子所说的“仁”。我以为学生要把握这个人类学的社会哲学, 才能学好人类学。现在, 国内有不少学生反映不能很好把握人类学, 入门有困难。我觉得这是因为我们这些老师没有把人类学的这一精神讲清楚。遗憾的是, 最近后现代主义思潮传入中国, 一下子又把大家引向了另一种社会哲学。后现代主义有很多西方个体主义的因素, 它对权力、集体表象、社会、文化的批判, 反映出西方极端关注个人的心态, 但现在已是“世界潮流”。我特别喜欢人类学家莫斯, 他为我们指出, 社会不能缺少一种慈善心, 不能缺少交流, 不能缺少人与人的心心相印。实际上, 要说清楚这些, 不容易, 在目前中国功利主义盛行的情况下, 谈这些是有障碍的。所以我们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我的回答你也许还不满意, 不过, 我实在认为, 人类学的门槛是一种“人类学信念”, 我建议学生要是希望知道这个门槛怎么过, 先要读一批书, 特别是人类学的经典之作, 不读书不能成为学者, 这是很自然的事。另外, 读书又要选对于我们生成信念有帮助的。至于怎么说清楚这个信念, 这些年我做了点努力, 我针对经济学写了一些小文章, 从莫斯、波拉尼、杜蒙等人的著述, 来看人类学家怎样批驳经济学中心主义、个体主义方法论的。这些年我编选“现代人类学经典译丛”, 对这方面的论著也给予更多关注。

徐: 我们这个时代却是市场压倒一切, 与人类学论述中的社会不同。

王: 是啊, 也因为这一点我很高兴, 我们从事的人类学研究有其独到之处, 我们试图通过把握文化, 把握社会, 来超越个人理性。

林: 我这里有个问题想问, 就是你刚才说人类学不仅研究村庄, 人类学应该有一个宏大叙事, 跟历史学有共同关怀。大学时我学的是哲学, 我们读的哲学, 感觉好像是在通过宏大叙事去关怀历史, 关怀人类生命存在的状态如何变化。哲学与人类学这两个学科之间关系如何?

王: 我同意这么一个观点, 这个观点认为人类学是一种世界解释, 是在人的具体的日常生活中思索的“一般思想”, “一般社会思想”。真正的哲学, 今日已不可能, 经过长远的历史冲击, 古典宏大哲学衰败了, 以前哲学是无所不包, 现在的哲学好像在变成社

会科学的某一支流, 哲学谈的问题都是社会科学在谈的。人类学有这个好处, 它是对所谓“土著人的哲学”的一种总结, 是对一种对不被关注的思想的一种体验。我们经常不关注平常人怎么想, 但是人类学家很独到, 他说这些平常人的思想就是哲学。

徐: 或者也可以说这是一种草根哲学。

王: 可以这样说, 但不全是。人类学定义中的“常人哲学”意义重大, 人类学家甚至认为这种哲学才是真正的哲学, 虽是“草根的”, 但对于哲学思想者(即所谓“受访人”)来说, 它就是一切。胡塞尔、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这些哲人的东西很受人类学欢迎, 是因为其中有很多人类学因素。

徐: 人类学的门在那里? 它既不是文化也不是社会, 它应该超越文化和社会, 跳出来?

王: 人类学者关怀社会或文化的观念, 他们宣称其试图解释的对象是超个人的, 而他们也承认自己的解释是非个人的解释, 是文化的一部分。

徐: 请你还是给初学者一个非常明确说法。

王: 有关这些, 我也写过文章, 人类学有国别传统, 在英国, 德国和法国是不同的, 因为这三个国家的人类学不同导致我们有文化和社会概念的不同, 但事实上这两个概念是一样的, 它们都是借以表达人类学家的信念的概念而已。

徐: 这在《人类学是什么》你没有写。

王: 写到一点, 关于国别差异, 我在《漂泊的洞察》(上海三联书店 2003 年版)一书中有一篇文章专门谈到。至于你一直追问的“门”, 我想你可能是指方法上的基本点。我以为我们上面已谈到, 这里有必要重复说的是, 进入人类学研究的“入门”, 被认为是“田野方法”, 这又包括参与观察、主位解释、整体论。三位一体, 意思是要求人类学研究者要有一种实践中的想象力, 要有能力将被观察的人类生活关联在一起, 态度像中医而不像西医。中医是说你的身体是完整的, 西医是说你这个身体可以肢解或解剖的。人类学要入门, 要先知道人类学研究依据的观念接近中医, 接着, 还要知道这三个东西结合形成了“人类学的眼光”。人类学虽是西方的学问, 但这种眼光来自于人类学研究的非西方, 在西方被称为“他者的眼光”。我们中国也可以说有跟西方一样“他者的眼光”, 唐代的玄奘, 是最典范的, 而历史上中国有大民族主义, 这种大民族主义, 也需要过它的边陲, 所以也生产出一种相当于“他者的眼光”的东西。人类学的眼光, 当然是有它的虚伪性的, 它可能掩盖了某种支配实质。比如, 外国人写中国, 为的是他们自己语言文字中学术的丰富性和支配力。而国内也可能一样, 比如我去少数民族地区调查, 之后写出来的对这个地区的描述肯定是汉字的, 是对汉字代表的文化

支配力的支持。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作为学者应该有怎么样的良知?这个问题值得思考。而我觉得人类学还是有它的良知,特别是在文化和社会的概念上,人类学表现出的对于祛除近代西方个体主义支配力的反思,是一种良知。因为对人类学有这样的理解,所以我一直以为宗教人类学是人类学的基础。以前人类学以为自己是研究亲属制度的,但亲属制度的研究专家最后却发现,从这一研究能推导出来的看法,其实牵涉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在不同文化中,是观念化的实践。费先生一直强调的 ethnos 就是这个意思。

林:王老师是不是在用人类学的观点来批驳后现代的个人主义的一些不正确的东西?

王:个人主义不是后现代的,但后现代有一部分是用来装饰个人主义的。

林:现在学界是很混乱,包括我们在学的过程中碰到这一块就觉得很头疼,好像找不到入门的感觉。

王:我以为学生有权力追求思想的真正解放,不要落如任何表面上新的“主义”的圈套。

徐:人类学你学得多一点,就解放得多一点,你学得深一点,解放得彻底一点。如果你觉得还有什么的话,那就是没学好。我们不断在学,不断在看书,不断在买书,不断在讨论。

杨:王老师,我现在正在做毕业论文,想就此提几个问题。原来选定的课题和王老师做过的仪式调查相似,你在博士论文里面已经做了,你从历史人类学方面的,由历史,文化,还有权利三者搭建起来的一个文章,这次下去了以后发现了,就是说当地知识里面,有一个现象引起我的注意,结合你的历史人类学对我的启发,我就觉得他们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它整个的师公队,包括它的师公戏,好像是从80年代才开始的,之前的因为文革嘛,都全部断掉了,然后包括那些老人,和当地的精英,在80年代后重新共同创造,或者一部分人建造,总之是接受了这种全新的东西,然后就认为是我们以前的传统了,以前的人都是这样干的。就好像是一种集体失忆。还有管师公队的头吧,他同时也是一个国家干部,他唱的却是当地最喜欢听的五代同堂,六代同堂,一边抓计生一边鼓吹说子孙多,当地的人喜欢热闹,喜欢人丁旺,就要唱这个,唱那个三天三夜的大戏的时候就是要唱这个,四个小时的剧本。我就觉得他这个人这个身份在这两者之间或者更多重的关系之间游走的时候,他是如何能够平衡的?也许不仅仅是他自己的原因,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它是一个剧团,有经济上的原因,有地方上的原因,有文化上的,还有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为什么一种传统的东西,现在就那么兴旺?

王:两个问题中,后面一个问题我曾经涉及过。为什么有一种文化复兴?为什么与现代化相反有一种历史回潮?我认为原因是文化的生命力比政治经济要强。要说明这个力量的强弱,要有个具体方法。举一个例子吧,在农村你能见到一些老人家,他们的年龄其实已大大超过共和国的年龄。一个人的历史超越政权历史的时间,表明他承载的文化,更可以代代相传,他可以传给他的子孙,外面不能说,他在内部,在家庭内说。传统的复兴还有其他原因,我觉得现代性的软弱是其中一个。社会学家告诉我们,对个人来说,现代社会是高风险的社会,而这种社会为我们提供的克服风险的机制,是专家主义的,专家主义实际还没有提供一套克服风险的完备知识。因而,在现代社会中,宗教和传统仍然是有生存空间的,甚至这种空间还在扩大。过去我们一直以为,现代社会依靠科学能够彻底克服风险,我们没有意识到风险包括天灾和人祸,有的是自然造成的,有的是社会造成的。用科学消灭宿命论,是一个容易实现的理想,因为宿命论是社会的产物。对于这些问题,人类学的解释更值得关注。人类学认为,神话比历史重要,为什么?神话是没有时间的,它是超越时间的,时间不断流动,而神话是永远蔓延。对于变迁来说,时间如果说指的就是政治经济方面的变动,那么,神话则保留着一种绵延性,与时间的变动构成反差。我以为,今日的传统复兴,恰是在这个反差中获得价值和意义的。这与你的论文选题精神上是相近的。至于说演戏的人怎么样保持一种平衡心态,他们为什么有生存的合理性,导致他们可以生存?我以为可以用前面说到的“传承”来看。另外值得考虑的还有一些制度性的因素。我认为仪式表演群体的复兴,与地方社会中的传统复兴不可分割,是相辅相成的。那它们共同创造着什么?我认为是一种地方公共性。这种公共性在历史上即已存在,比如,“土改”以前,我研究过的村子都有公田和与之相关的祠堂、庙宇。“土改”时,这些公的土地被平分,土地变成国有—私有相结合的,地方公共性被压抑了。现在一些地区出现传统的回潮,与这种地方公共性的重新建构有密切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对土地制度史变迁的某种民间逆反。

徐:我们已经聊了两个多钟头,王教授下午还要作文化生态学的讲演,需要休息一下,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谢谢!

[录音整理 杨清媚] ■

收稿日期 2005-12-27

[责任编辑 廖智宏]

[责任校对 何荷]